

抗战初期的忠义救国军

●何　蜀

如今许多人对忠义救国军的认识，是出自当年那个"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个漫画式的描写，用在某些具体的忠义救国军队伍上，是有根据的。不过，若据此来评价整个忠义救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加分析地否定其所有为抗日战争作出过贡献甚至牺牲的官兵，则未免有些片面了。


▲抗战时期的文强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文强老人，曾亲身参加过忠义救国军的组建和前期政治领导工作。笔者近几年对他作过反复调查采访，并参阅了一些有关资料，了解到了忠义救国军另一个侧面。

八一三战火中诞生的别动队

要讲忠义救国军，就得从它的前身——八一三上海抗战时的别动队说起。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到一个月，9月4日凌晨，蒋介石电令戴笠与上海著名帮会头领杜月笙合作，限一个月内成立一支1万人的抗日游击部队，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进行骚扰、破坏、袭击，并肃清汉奸日谍的活动。

戴笠当即决定将这支游击部队命名为别动队，并在其上建立一个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指导机构，聘了一批各界名人作委员，戴笠本人兼书记长实际负责，任命文强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上校人事科长，负责这支部队的具体组织工作。

随后，戴笠率领一班人与杜月笙举行了两次会谈，确定了高级人事安排。杜月笙推荐的刘志陆担任别动队总指挥，另外推荐了陆京士、朱学范、陶一珊任支队长。其中陆京士与朱学范都是邮局工会领袖，陶一珊是上海公民训练联队总队长，又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戴笠另外推荐了黄埔学生张邺作支队长，还推荐了几个黄埔同学任其他主要职务。

在当时战事紧急情况下，别动队限一个月成军，并要配合正规军与强敌作战，弄得不好就等于是驱羊群人虎口。为此，戴笠向文强交待，一定要充分运用上海社会上的帮会关系，将三山五岳的帮会头面人物团结起来，通过他们去组织好人马。他还要文强速电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输送军校毕业同学中尉、校级资历者600名来沪报到，并注意考核，宁缺勿滥，按资历分批安置为别动队各级干部；又电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派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人来沪报到，安排到各中队作政治指导员；又电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

'中间路线'或'自由主义运动'在香港所遭到的重大的打击"，"中间路线"的呼声，"在声势浩大的左翼力量打击之下是显得非常微弱无力的"。为了进一步扩大座谈会的影响，《华商报》还开设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批判"专栏，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纷纷撰写文章指斥"社会经济研究会"、"新第三方面"和"中间路线"，从而使座谈会的精神得到了更大的宣传。

这场以痛击美蒋所谓新"中间路线"的斗争，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进一步团结广大中间力量，孤立行将灭亡的蒋家王朝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

责任编辑　杨小波

肖白，抽调200名以上中高级干部来沪，听候分配工作。班长一级干部，非久战之兵不能胜任，临时培训又来不及，戴笠叫文强亲到浦东南桥总部向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张发奎求援，请张将军从该部队商调600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到别动队服务……

这些事情，文强都在一周内完成了。在南市白云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楼上，专门安排了两个房间，解决报到干部进入租界的问题。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大头领。青帮原为清代民间以封建迷信为纽带、以家长制为组织形式的秘密结社。到了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掠夺，迫使中国自然经济迅速解体，造成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人数剧增，这些人就成了青帮与另一民间秘密结社"洪帮"(又称红帮、洪门)的主要成分。孙中山就曾注意到民间帮会的力量，他领导发动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就主要是依靠当时称为"会党"的帮会力量。后来，青帮在上海设立中华共进会，红帮也与之合流。袁世凯利用这一组织，刺杀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927年上海帮会又为蒋介石所用，参与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

蒋介石在八一三抗战中又下令利用帮会力量，显然是国民党缺乏共产党那样深入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能力，也因为在当时紧急情况下，通过帮会来组织发动群众不失为一条捷径。

当时帮会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是相当大的，老报人徐铸成举过一个生动的事例：1936年《大公报》增设上海版时，起初因未与帮会拉上关系，竟一份也卖不出去。由此可见一斑。那时，一般市民和底层劳动者，为了家庭安全和职业、生计，都不得不参加帮会组织。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闸北、杨树浦、沪西南一带的工厂、商店纷纷停业，青年工人、店员、学生踊跃参加抗战，加上帮会组织的发动，别动队很快就拉起了队伍。

这一次，帮会中的广大群众又跟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反清武装起义一样，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入到了为民族解放献身的斗争中。他们为早已失去存在价值的原始、落后的封建帮会最后阶段的历史，写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页。

别动队中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青年

据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的张执一回忆，中国共产党也在别动队中组建了一个大队：

经军委同意，由我通过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洪帮头子向松坡(号海潜)的关系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并到国民政府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委任的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一个名义。第一支队长何行健(号天风)，是一个旧军人，洪帮，他当时因要取得我方的信任以便进而取得向海潜的信任，表示愿意听我方的话(我是中共方面的人，何是知道的。何后来成为戴笠的人，旋又投降日、汪，被戴笠派人打死在法租界)。当时何某曾委任我为该支队部的上尉书记官，余纪一(当时名俞华)同志为中尉书记官，后因病早离开。这时经组织允许，便以洪帮名义组成第三大队，人数约五百多人，领到长短枪各二百五十支，每人还发了四个手榴弹。游击总指挥部派了一个黄埔四期生任中校大队长(我们不让他取得实权)，(中共)党员王际光(任铁峰)任少校副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小队长等，均由秘密党员或进步分子充任。可惜领导人员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动派的破坏，不久王际光擅自带十多个干部离队潜逃，以致工作遭到失败。(《革命史资料》第5辑第10页)

尽管这段回忆不够详细，但由此可知，当时中共方面也派了人员参加到别动队中。

在著名作家、编辑韦君宜所写的《思痛录》一书中，也提到延安一个青年记者，原是上海绸缎庄伙计，因抗战爆发后参加过别动队而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了"特务"。显然，当时参加别动队的爱国进步青年也是很多的。

在新组建的别动队中，有许多是经章乃器等爱国人士介绍来的失学失业青年，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的青年，不少都具有大、中专学历，把他们作普通列兵使用，未免可惜。于是，戴笠决定由苏浙行动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余乐醒和总务组长谢力公分头负责办了青浦和松江两个技术干部训练班，各训练500人，以一个月时间，训练侦察、行动、爆破等技术。

谁知，青浦班训练刚刚毕业，松江班还未毕

业，日军就已在金山卫登陆。松江班训练地距金山卫很近，学员突遭袭击，500人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被敌人追击到一水潭中，以手枪击毙数名敌兵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壮烈牺牲于敌军乱枪之下。

抗敌功绩不可抹杀

别动队参战后，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4个支队12个大队都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与日军血战。

文强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都能坚持奋战到底，主动堵住阵地上被日军突破的缺口，有的甚至得到撤退命令也不撤离，誓与阵地共存亡。

文强亲见何天风支队(以帮会成员为主)一个名叫李穰的大队长，在日军坦克向北四川路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他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文强还见到朱学范支队(以工会会员为主)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率队作战，接连3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阵亡，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口号激励士气。他身负重伤后，与幸存战士撤到一便桥下，被敌机发现，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勋周身着火，胡须头发都被烧光，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仍因伤重从此身残。

到11月初全线撤退前夕，文强奉命率叶霞娣、赵蔼兰、陈难等女工作人员代表苏浙行动委员会前往租界各医院慰问别动队的500多名伤员。当时据人事科调查统计，别动队阵亡官兵1500人以上。

最后在正规军奉命撤离时，上海南市地区只留下了一个旅，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死不退，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历时3天，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张邺领导的第四支队在苏州河畔掩护正规军撤退中，伤亡惨重……文强曾为这些爱国志士们的英勇抗敌壮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初期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

上海大撤退前夕，文强奉调为军政部前方办事处上校处长，主要任务是收容自上海撤退的国军及别动队溃散人员。在沿途遭到日机轰炸、扫射，到处发现汉奸、日谍破坏捣乱的严峻形势下，文强将前方办事处在句容县成立起来，向镇江、金坛、浦东、常熟、无锡派出了5个收容小组，先后收容了3万余人，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收得2000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上海抗战中牺牲了。

文强率队沿溧水、当涂、芜湖一线转移，将收容到的正规军官兵归入集训部队后，到了江西湖口，尚余非正规部队的抗日战士1万人。这批人员奉命集中于安徽的祁门县历口镇和浙西的淳安、遂安两县整理训练，更名为军委会教导第一团。原别动队一支队何天风的残部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合编为教导第二团。

1938年1月，前方办事处奉命撤消，文强改任军委会教导总团部少将政训室主任，负责收容部队的整训工作。当年春节，戴笠在祁门历口的联欢会上正式宣布：教导总团完成任务后改名为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给文强谈起，是因为该部队成员多为青红帮徒众，对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什么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5月底，部队训练告毕，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支队，并建立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先是戴笠自兼总指挥，以后改由前别动队总指挥、桂系将领俞作柏担任总指挥。初期的2个支队，不久扩大为10个支队和1个行动总队，分驻于武进、江阴、常熟、浦东等地。活动地区主要在苏、浙、皖三省，沿京沪、沪杭两路与长江下游一带。

这时，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于第三战区

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安徽南部屯溪一个官僚地主住宅杨家大院。文强完成训练整理部队任务后，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部少将政治部主任。

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春夏间先后迁驻皖南岩寺、太平县、南陵县，最后驻于安徽东南的泾县云岭，与忠义救国军总部隔黄山相望。

这两支同时活跃在江南敌后的新建抗日游击部队，分别由国、共两党领导。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刚开始形成高潮，尽管仍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内部磨擦、冲突尚未像后来那样激化。

除去这一大背景外，当时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上层领导人之间还有较好的私人关系。

时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的文强，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原名袁裕)是黄埔军校同期同科同学，他们那时同是中共党员。北伐前夕，他们一起被选拔到广东大学参加特别训练班学习。北伐开始后，袁裕被调到第四军左翼宣传队，文强则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两人从此分手(后来文强在四川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因被执行王明路线的省委错误处分而负气离川，脱党后几经曲折，在抗战前夕投入国民党阵营)。

时任忠义救国军中将总指挥的俞作柏，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后同学，还曾有过在广西共同反蒋的历史。北伐时期，俞作柏是广西国民党人中的左派首领。他的同父异母小弟俞作豫，就是在他那里阅读了共产党书刊，结识了共产党人，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1929年春爆发蒋桂战争，俞作柏在共产党人支持下采取“先倒桂后反蒋”策略，在桂系溃败后回到广西出任省政府主席，与时任广西编遣区主任、绥靖司令的表弟李明瑞一起，抵制蒋介石、汪精卫等方面的拉拢，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帮助工作。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率一大批干部到了广西，张云逸就是其中一个。在邓小平、张云逸等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推行新政，释放政治犯，开放进步的群众运动，任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这年10月1日，俞作柏通电反蒋，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反蒋失败后，俞作柏逃往香港，李明瑞率部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左江龙州起义。俞作柏之弟俞作豫在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在广州黄花岗英勇就义。

由于主要领导人之间有了这样的特殊个人关系，忠义救国军起初同新四军的关系还是较好的。

1938年夏，第三战区政治部在屯溪黄山旅馆召开政工会议，文强与袁国平代表两军政治部出席，对坐于会议桌两边首席座位，会下两人常在一起长谈。在会后两人推心置腹的谈话中，袁国平谈到了周恩来对王明路线时期四川省委错误处分文强一事的批评，并说到希望文强“归队”，恢复中共党员党籍。但文强未表同意，只说待抗战胜利后再考虑。不过，他向袁国平保证，一定对共产党以友人相待，精诚合作，共赴国难。袁国平给他留下了宜兴县城里一家杂货店转信的秘密通讯处，并约定了彼此的化名。但是后来文强按那地址去过几次信均无回信，他与袁国平从此失去联系(一年多以后，文强在上海租界“孤岛”担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时，发生了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后来他才知道，袁国平在这次事变中不幸殉难)。

令人痛心的内战

在1939年春夏间，文强奉命率总部参谋处长郭履洲、军需处长周家礼组成的忠义救国军总部视察组，到上海、浦东、江阴、无锡、常州等地视察活跃在游击区的十多个忠义救国军游击支队，为时半年多。

当文强一行视察到江阴时，在那里的总部副指挥兼淞沪指挥官杨蔚告诉他们，忠义救国军第五、第七两个支队与新四军发生了磨擦，新四军被俘十余人，已经军法审判，由杨蔚批准“就地枪决”。文强知道杨蔚和五支队队长阮清源都是反共顽固派，对事情的处理显然带有个人因素。他便以大敌当前，不可自相残杀，有问题可向新四军军部提出，以和平方式调处解决等道理，先说服了视察组同仁，然后以总部视察组名义过问此事，继而说服了杨蔚，将原定的立即枪决暂缓执行。

文强又对新四军被俘人员逐一讯问，查验身份。为首的一名姓蒋的青年军官，自述原为广西部队中的排长，因参加淞沪抗战被日军打散，后为新四军收容，作战有功，提升为大队

长。文强查验了他的证件，向杨蔚提出将他们一律释放。杨蔚与阮清源坚决反对，双方发生激烈争论。但毕竟文强是总部政治部主任兼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又是总部视察组组长，所依据的又是团结抗日的大道理，最后由郭履洲提出折衷办法：由文强将蒋某一人保释，带回总部“教育”，其他人员由五支队负责教育释放——后来杨蔚与阮清源是否将那些新四军人员释放？文强不再知道。蒋某在文强身边工作了半年，后由文强保荐进入中央军校受训。

当文强一行视察回到屯溪忠义救国军总部时，得知总部发生了一起“反革命组织”案件，但他不知其详。此前，戴笠曾向他探问过，说是有人告发刘人奎（忠义救国军总部联络参谋，原中共党员，曾与文强在四川一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由文强介绍加入忠义救国军）与中共方面有往来，文强为刘人奎作了辩护，劝戴笠说，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戴笠也就未再追问。据刘人奎在30多年后回忆，此案系忠义救国军总部参谋处破获，抓了两人，一个是姓张的参谋，判了15年徒刑；另一个是姓李的政工队（即文工队）女队员，人称李大姐，被判了死刑。刘人奎回忆说：“实际那个组织——抗日同志会，是我们3人搞的，因为我先两个月离开了屯溪，未牵连进去。文强那时很为我担心，但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不久，俞作柏与文强先后被调离忠义救国军总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活动也日益发展，以后该部与新四军的关系日益恶化，内战不断，形成令人痛心的局面。

不过，当时不只是在国民党军与新四军之间有磨擦内战，在忠义救国军内部也一样有过内战，如丁锡山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八支队（驻浦东）就与南汇县长于陶生领导的四支队、川沙县长李子明领导的三支队发生过火并。因忠义救国军是原别动队改编而成，这种内战便被当地群众讥为“别吃别（鳖吃鳖）”。

为民族解放写下了独特篇章

不可否认，忠义救国军这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同抗日战争时期形形色色的众多游击部队一样，也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自己独特的篇章。

诚然，因其基本队伍系旧时帮会成员及在民族大义感召下收编的土匪队伍，政治素质差，又缺乏有力的纪律约束与思想政治工作，当抗战转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忠义救国军不少官兵甚至高级指挥员（如一支队指挥官何天风）叛变投敌，成为汪伪政权的走卒。以致在后来那部著名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被刻划成了土匪加汉奸的反面形象。不过，即使如此，在那出“样板戏”中也还不得不保留了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曾与日军作战，被日军追杀时得到中共地下党员阿庆嫂救助方才脱险的情节——若抹杀这一情节，整个故事就无从讲起了。

不能因为出过败类就抹杀其他为国捐躯、为民族解放流血的忠义救国军官兵的历史功绩。1939年春初，日伪军向江阴、常熟一带扫荡，忠义救国军第六支队在总部联络参谋兼六支队政训室主任刘人奎率领下，占据一桥头抗击日军，经过半天恶战，伤亡惨重，刘人奎身中3弹，幸好日军因天黑集合撤离，没有仔细搜索，他幸免一死。敌军走后，当地群众来战场搜寻，才把他背到一老乡家里救治。因为这次战斗，俞作柏以忠义救国军总部名义发给刘人奎200元奖金，并报请军委会给他颁发了“忠勇”勋章，还晋升为上校。

像这类与日伪军作战的情况，在忠义救国军是并不少的（文强的堂弟文斐然就在任忠义救国军大队长时率部与日伪军作战壮烈牺牲），日本侵略军深感头痛，将该军称为难于对付的“江南野鼠”。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对付忠义救国军的特战班，汪伪特工总部也专门建立了“肃清忠义救国军工作团”。日伪军为打击忠义救国军，多次发动清乡、扫荡。侵华日军总司令部还在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发动了目的在于“攻占并确保广德附近，以摧毁敌忠义救国军根据地，加强（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治安”为目的的“广德作战”（二十一号作战），以3个师团和1个以旅团为基干支队的强大兵力，攻占了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广德，并对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忠义救国军总部被迫撤往天目山区。

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而流血战斗过的人们，不论其政治背景如何，都理应受到后代的崇敬与讴歌。

责任编辑　杨小波